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著作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语言演化生态学

〔美〕萨利科科·S.穆夫温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著作



THE ECOLOGY
·
OF
·
LANGUAGE EVOLUTION

语言演化生态学

〔美〕萨利科科·S.穆夫温 著

郭嘉 胡蓉 阿错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演化生态学/(美)穆夫温著;郭嘉,胡蓉,阿错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

ISBN 978-7-100-08577-9

I. ①语… II. ①穆… ②郭… ③胡… ④阿…
III. ①语言演化—研究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73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

语言演化生态学

〔美〕萨利科科·S. 穆夫温 著

郭嘉 胡蓉 阿错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577-9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90×1230 1/32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 35.00 元

Salikoko S. Mufw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英文版译出

献给：

Ntazyel,

Ekyey,

Osum,

Zaki,

Sevehna,

以及

Tumunete

感谢你们的勇气和决心

致

Tazie

和

Embu

我们一起,为了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国外语言学译丛编委会

主 编：

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编 委：

包智明（新加坡国立大学）

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 兵（南开大学）

李行德（香港中文大学）

李亚非（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潘海华（香港城市大学）

陶红印（美国加州大学）

王洪君（北京大学）

吴福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袁毓林（北京大学）

张 敏（香港科技大学）

张洪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朱晓农（香港科技大学）

总 序

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一个“国外语言学译丛”，把当代主要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好的语言学论著翻译引介到国内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问，我国的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并不逊色的传统，为什么还要引介西方的著作呢？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大体而言东方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有差别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东方西方的语言学都是语言学，都属于人类探求语言本质和语言规律的共同努力，这更是事实。西方的语言学也是在吸收东方语言学家智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现在新兴的、在国内也备受关注的“认知语言学”，其中有很多思想和理念就跟东方的学术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有人问，一百余年来，我们从西方借鉴理论和方法一直没有停息，往往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还没有很好掌握，还没来得及运用，人家已经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了，我们老是在赶潮流，老是跟不上，应该怎样来对待这种处境呢？毋庸讳言，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确实有大量成果代表了人类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科学进步的观念，加上宽广平和的心态。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久的落后，要超过别人，就要先把人家的（其实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好的东西学到手，至

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

还有人问,如何才能在借鉴之后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呢?借鉴毕竟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的视野的确比我们开阔,他们关心的语言数量和种类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印欧语中心”的偏向。这虽然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批判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总要受事实的检验,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类型上有跟印欧语很不一样的特点。总之,学习人家的理论和方法,既要学进去,还要跳得出,这样才会有自己的创新。

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套译丛中得到收益。

沈家煊

2012年6月

译 序

对所有学语言学的人来说，如何把语言研究得最好是大家都关切的核心问题。要怎么研究语言，才能一代一代聚沙成塔地把知识的金字塔越堆越高？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是在好几年前，当时有个朋友比较了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行为。他说，数学家是站在同行的肩膀上，所以可以看得更高更远；可是语言学家却喜欢把别的语言学家踩在脚下！他对我们这一行人的评论或许过于苛刻，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学家常常爱摆空架子，把哗众取宠的新理论奠基在薄弱的证据上，于是才短短几个月，一出了新理论就把旧的给推翻掉。

我们现在都把“知识的金字塔”这个比喻，归功于 20 世纪的哲学大师胡适之先生，他说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其实这句话更早前就有人用过了，至少宋朝朱熹的作品中就找得到。当然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该自顾自地盖自己的金字塔，发表那些哗众取宠的理论。这句话暗示，我们努力堆砌自己的小砖头时，心里都应该有一致的愿景，知道自己这一小块砖是不是符合整个大格局，并希望别人将来也能以此为基础再把自己的成就累积上去。我自己就常以另一句更平凡的口号自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研究语言演化正是这种有价值的愿景，因此穆夫温(Salikoko

S. Mufwene)教授的这本书,对知识的金字塔贡献良多。演化理论是一座更高大的金字塔,对于解释我们生物界起着莫大的作用。早在150年前,演化理论的鼻祖达尔文就看出,人类演化和语言演化其实非常相似。他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一书里写道:

“如果我们拥有人类完整的族谱,根据不同人种所绘制的宗谱图,就能帮助我们划分目前世界上众多的语种……”

达尔文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生物演化和语言演化所作的比较。演化理论认为,改变源于三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一是变异,二是选择,三是复制再生。随着特定因素的作用,结果当然也会不同,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不管语言演化或生物突变,都同样涉及了这三个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我才了解语言之所以改变,也是经由人在不同的变体间作选择,这些变体可能是在词汇、发音或意义上相互竞争,也可能是在更高层次的句型结构上。^①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应当设法追溯那些成功的变体,看它们如何在语言内部不同的扩散阶段被保留而沿用下来。沈钟伟教授研究上海话里的音变,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②

印欧学家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③是第一位把演化理

① Wang, W.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② Shen, Zhongwei. 1997. Exploring the dynamic aspect of sound chan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1.

③ Schleicher, August. 1863. *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Weimar.

论运用在语言学的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才出版没多久,他的邻居,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把那本书当作礼物送给了他。可是19世纪的语言学家,把语言比作有机生物,这种比喻未免失当。正如穆夫温教授指出,语言比较像拉马克物种(Lamarckian species),可以把创新传递给下面几代,不管这些创新如何习得且何时习得,而且一代一代间的传递可以双向进行。但达尔文的演化论却排除了这些可能性。其次,语言就像寄生在宿主身上的物种,它的宿主自然是说话的人了。即使语言的结构再完美,要是没有使用它的人,这个语言仍会绝种。语言演化和生物演化的这些基本差异相当重要,穆夫温教授在书中曾多次详尽探讨这些区别。

我认为穆夫温教授这本书,还有他先前出版过的丰富著作,主要的贡献在于强调接触在语言演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19世纪的施莱谢尔所提出的语言演化概念,尤其是用树形图代表种系的方法,直到今日还影响深远。但这种看法过度强调了纵向传递的重要,而把横向传递边缘化了,因此扭曲了原本的演化观点。我前面引述过达尔文的那段话,也同样有扭曲事实的弊病,因此很快地就被达尔文的同行兼他的热衷支持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所驳斥。

卡瓦利斯福札(Cavalli-Sforza)教授和我曾经阐述过,横向传递可以是词汇发展的基础。^④ 我们最近作过另一项研究^⑤,试图以

④ Cavalli-Sforza, L. L. & W. S-Y. Wang. 1986. Spatial distance and lexical replacement. *Language* 62. 38-55.

⑤ Wang, W. S-Y. & J. W. Minett. 2005.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in language evolu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03. 2. 121-46.

量化的方法,把纵向及横向这两种语言传递模式结合起来。语言变化里的横向传递,现在才开始慢慢走出树形图的阴影,因此还须借助更多新资料和新方法予以深入研究。阿错教授的博士论文^⑥,研究藏、汉语的接触及混合,提供了很多新资料,使我们对横向传递有更深入的了解。

穆夫温教授在语言演化中,整合了纵向与横向传递两种方式,这么做完全是有实证基础的,他把对语言的细致观察,牢牢地嵌入了历史与社会脉络中,所以他的书名里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眼:生态。他举出了丰富的语言接触实例作为材料,其中许多语料是因为近几个世纪来随着殖民扩张才产生。他本身就是研究混合语言皮钦语及克里奥尔语的大师,而且他的研究范围遍及世界,跨足非洲、欧洲、美洲三大洲,以便寻找各类语言接触的根源。他的结论让人印象深刻,而且说服力十足,是帮助我们建构语言演化金字塔的不可或缺的砖头。

穆夫温教授研究语言,本着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辛勤耕耘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现在是为他 2001 年出版的书写序,但是他已经又接着出了一本 2008 年的书^⑦,书的副标题就用了接触、竞争和变化几个字。本书的几位译者郭嘉、胡蓉、阿错教授特别值得嘉许,他们以精湛的译笔接受了这项困难的挑战。书中不少专有名词和观念来自不同的学科,对于学习语言学的人不免有些陌生。但是他们借着翻译引介这部作品,为我们中国语言

⑥ 意西微萨·阿错. 2003. 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⑦ Mufwene, Salikoko S. 2008. *Language Evolution: Contact, Competi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Continuum.

学拓宽了跨学科的新视野。有了这些人筚路蓝缕的艰辛为我们打下基础,相信未来演化语言学方面的译书,能够进展得更平稳顺畅。

王士元

2009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

前 言

xi

本书介绍了我近十年来关于与语言演化(language evolution)相联系的克里奥尔语发展的一些观点。这里使用“语言演化”这一概念,来指在一门语言的结构及语用方面可观察到的长期变化;以及在那些并非鲜见的案例中,一种语言演化形成其子变体,这些变体有时被鉴别为新的方言,有时又被鉴别为新的语言。这一概念还涉及有关语言濒危和消亡的问题。

同时,本书还反映了在传统上被归为“克里奥尔语起源(creole genesis)”^①、第二语言习得以及发生语言学(genetic linguistics)等领域中我自身学识的发展,并回应了一些同行的请求,他们请我就自己所质疑的一些假说提出使人信服的方案。我的回应可归结为这样的观点,从认识论的角度,克里奥尔语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们刚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语言学的,并非由于它们的演化过程有别于其他语言的发展,也不是由于它们的起源根植于那些极其有别于非克里奥尔语的演化所处的社会历史生态,甚至也不是由于它们代表了语言系统的某种普遍的结构类型。

^① 通常,我会避免采用这一既定的术语,因为它易引起误解。尽管克里奥尔语特征的起源已经吸引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克里奥尔语发展的讨论日渐增多,这些讨论已经超越了仅仅对相互接触的语言特征的选择,而且还涉及将各种特征整合为新系统的情形。

它们和非克里奥尔语一样自然存在。事实上,当我们越了解它们,我们就越应该去重新检视我们自以为理解颇深的关于语言的诸多事实。

我将这些论文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我认为这是记录我思想发展的最佳方式,尤其对于下列的一些主题:克里奥尔语的发展;语言接触生态在决定克里奥尔语结构方面的本质与意义;相似的生态在变化中是否起到了与传统发生语言学家所认为的相同的作用? 克里奥尔语是否真的在语言传承上与其词源语言(*lexifier*)无关,以及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将其看作“语言的私生子(*children out of wedlock*)”? 另外,我还试图回答我们能从语言多样化中了解到什么,以及有关克里奥尔语发展的研究对于目前语言学家极度关注的语言濒危问题有怎样的启示?

本书还揭示出,我所从事的这些研究远比现有的相关文献让我们相信的还要复杂得多。看上去,历时语言学有必要开展一项与此书同名的研究项目,以语言演化的生态为焦点,提出了驱动问题(*actuation question*)。实际上,这也就是说不光要关注一种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种环境(其外在生态(*external ecology*))——如接触环境以及不同的使用者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还要关注语言系统在变化前及(或)变化中各个语言单位和规则相互共存现象背后的本质(其内在生态(*internal ecology*))。我的观点是,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在决定一种语言的演化轨迹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我将其类比为生物中的寄生物种。

由人口发生学(*population genetics*)受到启发,我着重考察一个语言物种内部的变异,或者是由数个共存语言物种组成的大的群体中的变异。我说明了生态在竞争和选择中是如何“掷骰子”

的,这不仅决定相互竞争的语言中哪一方占优势,而且还决定了哪些语言单位和规则被选择进入占优势地位的语言变体。基本上,在相同时期,相同的词源语言产生出克里奥尔语的过程中也同样产生了非克里奥尔语变体。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我们还可以理解是什么使得一门语言以其他语言为代价得以繁荣昌盛,反之亦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态中是什么侵蚀了一门语言的生命力。本书各个章节显示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我的工作还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包括对发生语言学的一些能够实际应用的假说进行重新思考。在本书第1章中,我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这些问题。

我使用克里奥尔语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只是因为我对此进行过更多的研究,可以冒昧地自诩理解有关这一语言演化的所有事情。另外,我还期望能够努力促进研究特定语言与研究普通语言之间的交流,具体地说,就是期望有关克里奥尔语的研究能够为理解语言有所贡献。在本书中,因为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似性(而不是任何其他令人信服的缘由),使得克里奥尔语时而与其他语言归并在一起,时而又被排除在外,导致事情有些错综复杂。

与一些克里奥尔语学者的常论不同,我认为克里奥尔语不是突发式的演化,也不是其源语言传递间断的副产品。它们之间发 xiii 生学上的联系,最明显的地方在于其词汇的极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欧洲语言,这里将其称之为克里奥尔语的词源语言(*lexifiers*)。克里奥尔语语法的来源就更为复杂,但绝不可否认不同种类的非标准词源语言的混合遗传(*blending inheritance*)对产生这些新语言体系所起的作用。克里奥尔语也并非产生于没有目标语的环境,

尽管人们也承认,由于在殖民地种植园里词源语言的各种变体(母语的、非母语的)的实际存在,这个目标语比起其他情况中的语言传递已经十分分散。这些新的语言也并非由孩子们创造;否则它们不会像现在这般复杂。与其他非克里奥尔语言相比,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处于一个发展被抑制的阶段。它们不是由于接触而促成的语言重构(restructuring)或系统重组(system reorganization)的唯一案例,促使它们发展的接触与那些应该被提及的,比如由俗拉丁语形成罗曼语种(Romance)的接触,也没有什么不同。

按照我在第1章中的划分,克里奥尔语是一些新的语言变体,它们起源于17到19世纪的欧洲(亚)热带殖民地,是由那些非(纯粹)欧洲人后裔将西欧语言的非标准变体(nonstandard variety)加以改造而产生的。与在相同的(前)殖民地里由一种西欧语言发展起来的其他任何本地语(vernacular)一样,它们在结构上异于在欧洲所使用的语言变体,彼此之间也不相同。尽管有人争辩说这些新本地语中的一部分与其大城市的对应语言之间有所差别,而且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有的彼此之间的差异程度很大,但是这一评价缺少可操作的标准,因为事实上在不同的环境中,其词源语言很难完全一样。相互之间的理解程度也不太可靠,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后裔还使用了其他的、相互懂度很低的殖民地本地语,而这些本地语并没有被鉴别为克里奥尔语,比如,北美旧安曼教社区的英语。主要的但又含糊其辞的标准是使用者的种族,这一标准令语言学界比较尴尬,但是却还没有进行过相关讨论。一定程度上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因素,在克里奥尔语学界用以解释克里奥尔语发展的大部分假设可以设计得更好,可以如我的谴责声一样强劲有力。其他的原因将在下面提出,并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讨论。